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早期改良思想家

诗文选译

● 刘 崇 敬 ●



巴蜀书社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早期改良思想家
诗文选译

刘 崇 敬

巴 蜀 书 社 中国·成都

责任编辑：施 维

封面设计：李文金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早期改良思想家诗文选译

刘崇敬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00 千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80523—816—2/I·332

总定价：460.00 元（共三十九册）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主 编：戴 逸

副主编：杨东梁 段文桂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汝丰 王俊义 牛仰山 冯 杰

孙 静 李 侃 杨天石 杨东梁

杨宗义 张我德 胡绳武 郭毅生

段文桂 段志洪 龚书铎 程 歆

戴 逸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编）

序 言

戴 逸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采，它的意义，比得过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

丽的盛世辉煌。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懑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国步日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概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还可以带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颠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锋颖凜凜”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们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近代的文章当然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

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舸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忱、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鹭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胡林翼的笃沉。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目窥其手裁，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无尽的宝藏。

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邱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

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四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是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劳动。

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辑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前言

——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思想略论

(一)

1840年英国资本主义发动的武装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给老大的中华封建帝国带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它严肃地向中国人民提出了一个怎样抵御外侮、富民强国的重大历史课题。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大门，促使中国人从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鄙夷外国，妄自尊大的心态中惊醒，唤起了封建士大夫阶层中一批有为之士的冷静思考 and 对中国前途命运的高度关注。他们开始放眼全球，为挽救民族危亡，向外部世界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纵观中国近代史，既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侵略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和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又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历史。

鸦片战争后 19 世纪 70 年代，中国农民阶级反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和地方阶级压迫的斗争，以太平天国的失败而趋向低潮；清朝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在共同镇压农民革命运动、维护中国半殖民地政治秩序的基础上，由鸦片战争时期互不了解、互不信任、打打谈谈的敌对关系，转变成为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友好合作”的新格局。外国侵略者通过各种方式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和进行控制，清王朝则依靠外国势力维持垂危的封建专制统治，从而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得以暂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然而，此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凭借不平等条约，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进一步掀起倾销商品的狂潮。除了鸦片之外，棉纺织品、毛织品等工业品进口迅速增长。洋货大量输入，民族经济受损，入超严重，国弱民穷，民族矛盾再次上升。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渐形成，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具备，在外国入侵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和 60 年代开始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兴起的洋务运动的刺激下，一部分地主、官僚和商人、买办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转化为资本家或兼资本家身份，成为新兴的旧社会力量，即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一产生，便身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力量微弱，发展缓慢，迫切要求摆脱清王朝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束缚，迅速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便与外国资本主义抗衡。中国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思想家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适应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需要，肩负着如何才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抵御外国侵略，使中国独立富强的历史使命而出现在社会政治舞台上的。

具体言之，一些在洋务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思想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见识的工商业者、洋务人员或出使人员、到外国留学人员等，他们大多通过不同途径直接或间接接触过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比较了解，对洋务运动的弊端也有某些切身感受，他们不满意用封建官僚体制来办工业，忽视经济规律和社会效益，试图寻求一条振兴民族工商业的新道路。他们虽然与洋务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封建统治者或外国侵略者也存有不同程度的依附关系，但他们不是清王朝的当权派，也不是洋务派的实业家，而多半是由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早期维新志士。他们在评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的同时，不断提出反对外国经济侵略，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改革封建专制制度等变革主张，代表正在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反映日益壮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愿望，遂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思想家。其主要代表，19世纪60年代有冯桂芬；70年代有王韬、容闳、马建忠；80年代有郑观应、何启等。正是这些先进的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思想家，继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之后，把向西方的学习由军事技术推进到了一个发展经济、振兴工商和要求改革文化教育以及政治制度等新旧历史阶级。

(二)

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思想家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自涵有其特定的本质。这种特定的本质不仅决定着它的独立存在，而且还衍

射而成若干富有时代光彩的基本特征。我们分析研究这些基本特征，有助于确切地把握和深入了解早期改良思想的历史作用。

1. 忧国忧民，探索救国真理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

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思想家，同他们的先行者地主阶级改革派一样，都生长在神州大地，从小都接受华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儒家伦理道德的熏陶，都对祖国满怀炽烈热爱之情。他们面对祖国危亡，奋然而起。19世纪60年代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冯桂芬，在京都任职期间，耳闻目睹外国侵略者的野蛮残暴和清王朝的昏庸腐败，山河日益破碎，主权丧失，民不聊生，国威扫地，忧患不已。他以为这是“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并分析中国之所以屡遭侵略，备受外国欺凌的原因，从多方面进行了中国与外国的对比，明确指出中国有“四不如夷”，即“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为了改变这“四不如夷”的现实，遂以“自强、雪耻、救国”为宗旨，写下了著名的《校邠庐抗议》。在该书中提出了“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和“改科举”四项富国强兵的改革纲领，对近代革故鼎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冯桂芬上承19世纪中叶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放眼世界、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观点，下启19世纪下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思想，可以说是一座联结地主阶级改革派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桥梁，是一位开创中国近代早期改良思想的先驱。

70年代的王韬，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深感江河日下、国是日非之痛，每与友人酒酣耳热之际，常抵掌雄谈，声震四壁，慷慨激昂，泣下数行，表露了刚烈的忧国忧民思想情操。他因故流亡香港，寄身异乡长达20余年，

但他仍然念念不忘中国的富强，他陆续发表了很多有关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学习西方兴利除弊，振兴商务以及要求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实行君民共主等变法自强的政论文章，遂构成了他后来自编文集《弢园文录外编》的基本内容。

与王韬同一时期，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留学生，《西学东渐记》的作者容闳，当在孟松学校毕业时，为了要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宁肯失学，也不愿以来日充当传教士为条件保送上大学，决心运用一切机会，为中国谋福利。他明确表示，“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然政府不录用，不必遂有大作为，要亦不难造一新形势，以竟吾素志。”一片爱国赤诚，熠熠生辉。容闳一生以传播西学、培养人才为己任，他把兴办教育选送出国留学学生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他制定的《予之教育计划》，就是有关怎样选拔、分期派遣留学生以及怎样监督管理、学习内容与考核等的具体设想，开创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先河，给中国培养了大批新型人才，为西学东渐立下了一大功绩。在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地讲，所有早期的改良思想家，无一不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强烈的爱国主义者。

2. 批判洋务运动，反对外国经济侵略，主张振兴商务，发展民族工商业：

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思想家在抨击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盲目自大、因循守旧、不思变革的同时，对 60 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也抱着一种批判态度。他们虽然与洋务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有某些相通或相同之处，但他们对洋务派办企业依靠外国的某些买办性和经营管理上的封建性、垄断性，深表不满。王韬在《洋

务下》一文中，曾尖锐指出，洋务派一味追求练士兵、整边防、讲火器、造轮船是舍本逐末，徒袭西方皮毛之作。洋务企业实质上是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畸形的资本主义，既不能使中国自强，也没法使中国致富。历史证明，洋务运动虽然在客观上对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起了某种刺激和带动作用，但并不能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思想家在评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同时，不断提出反对外国经济侵略，振兴商务，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张，代表和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试图独立自主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美好愿望。他们汲取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洋务派学习西方的经验教训，随着对西方资本主义了解的日益全面和不断深入，并经过长期的实地考察研究，进一步认识到西方国家船坚炮利、武力强大是以工商发达、经济繁荣为后盾的。若单纯学习西方军事技术、船坚炮利，乃是舍本求末，不可能挽救中国的危亡。那么，要想民富国强，抵御外国侵略，与西方列强抗衡，就必须打破中国封建主义的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向西方学习，发展经济，以商立国。在这里应该指出，早期改良思想家所谓的商务，含义广泛，不仅包括商业、工业、矿业，还包括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等一切与资本主义生产有关的行业。

为了兴办工商，发展经济，冯桂芬主张“采西学”、“制洋器”，也就是学习西方“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这些“皆得格物至理”的自然科学；自造、自修、自用军械、轮船、农具、织具等先进利器。以《适可斋记言记行》一书闻名，我国第一个到欧洲留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马建忠，他认为富国之

道，首在富民。即国富是以民富为基础的；而且只有国家先富了，然后才能强。因此他提出要重商、护商以富民强国。还有提倡“恃商为国本”的王韬，呼吁“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救国的郑观应，以及倡导“复古因时”新政的何启等，都在如何创办工业、经营商业、开发矿藏、发展交通运输、开展国际贸易、改进财政税收，以及筹办银行和保险事业等方面，各自从自我的思想认识和实际经验出发，参照西学，拟订出各种方针政策和具体办法，从而，对中国近代振兴商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要求改革封建专制制度，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但仍归属改良思想家：

早期改良思想家不断探索和追求，并没有满足振兴商务、止步于经济改革，他们还逐步认识到，要想发展经济、兴办工商，必须依靠科技、依靠人才；要想开发科技、培养人才，必须更新文化、办好教育；他们还感到要想顺利推进这一切改革，富民强国，就不能不涉及政治制度的改革，于是他们又各自就废八股、改科举、兴学堂、办书院，设翻译馆、派留学生，以及创办报纸、设立议会、实行君主立宪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改革设想和具体建议。有着 50 年管理工商的实践经验、集早期改良思想之大成的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曾对这一维新改革道路作过高度概括。他说：“欲攘外，亟需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这一精辟的逻辑立论和具体主张，正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的中心思想和主要内容。

在这里，还要提到 80 年代另一位早期改良思想家何启，他

对新政改革曾进行过比较全面的研究。《新政真诠》一书除前总序和后总序外，共有六编。每编各具特色，各有重点。初编《曾论书后》，通过批判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先攘外后安内的主张，开宗明义，阐发新政的主旨；二编《新政论议》，详论新政复古因时的主要内容；三编《新政始基》，论述实施新政当以理财之法的先、理财之法又以广用贤才为要；四编《康说书后》，通过批判康有为“保国、保教、保种”的观点，提出今古异宜不能假借，以阐明新政精义；五编《劝学篇书后》，通过批判张之洞的“志是”、“论非”的《劝学篇》，阐明新政的孔孟之道依据，释消世人对实施新政的疑惑；六编《新政变通》，讲清新政终在必行的道理，使阅之者奋然兴起，为之者勿托空言。此六编，互相补充，互相联系，遂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新政思想体系。这不仅是他个人对新政理论的探讨，也是对早期改良思想和政治改革理论的贡献。

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思想家虽然从热爱中华、忧国忧民，立志挽救民族危亡的立场出发，勇于揭露清王朝腐败黑暗的内政，敢于抨击清王朝昏庸无能的外交，批判封建主义，但在学习西学，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历程中，却始终不渝遵奉天朝上国王道不易、封建伦常名教不变的信念。冯桂芬率先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样一条改革的基本原则。这与洋务派高唱的“中体西用”说，以及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道本器末”论，都是一脉相承，如出一辙。不论“本”也好，“道”也好，“体”也罢，其实质则一，皆系指儒家学说、伦常名教、宗法观念、封建政治制度等。凡属改良思想家，原则上无不认为这些是天朝上国的神圣产物，是完美无缺、不容改变

的。近代中国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不在“本”、不在“道”、不在“体”，而在枪炮船舰、科学技术，即所谓“器”、“术”、“用”之类能致国家富强的工具。但随着对西方资本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在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思想家思想观点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这条改革的基本原则，并非一成不变、一直处于僵化状态，而是或隐或显，有所修正、有所变更。宣扬“变古通今”说的王韬，早年原本视君民共主为荒谬，但为了寻求政治改革的道路，他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归纳为三种不同类型：一是君主之国，二是民主之国，三是君民共主之国。并对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逐一加以评论，然后明确指出，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有中国三代以上的遗风，最为理想。身处当时君主专制的中国社会，他竟如此称赞君民共治，触及王道，实属难能可贵。同时也有何启，在他的《新政论议》中，宣传“复古因时”论，提出七项有关“复古”的政治制度改革和九条有关“因时”的开发经济的措施，同样涉及到了“本”、“体”、“道”的微妙变化。而郑观应，则适应时代政治氛围的变化，引用《中庸》、《孟子》和《易经》中有关体用的论点，认为中庸之“中”，是“体”、是“本”，是不变易的根本原理；而因时制宜的“时中”，则是“用”是“末”，是可变易的权宜措施。“体”是先天的，人不能违背天道；“用”是后天的，人必须遵奉天时。并且认为“体”、“用”不可须臾分离，同等重要，“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由于扩大了“体”的内涵，于是他比王韬更进一步，敢于第一个公开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君民共主，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当然，“道”、“体”、“本”的内涵不管怎样变化，但万变不